

革命的幽靈： 兩個「反激進主義」觀點

陳宜中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本文探究當代大陸思想界的兩個「反激進主義」觀點，及其背後「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問題意識。李澤厚從告別革命的出發點，通過對辛亥革命、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以強化「革命有害無利」、「漸進道路可能成功」等政治見解。袁偉時則從思想啓蒙的視野，結合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通過對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以肯認中國「需要思想觀念的徹底變革」、「應實現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等主張。本文視李、袁的政治言說為當代大陸反激進主義思潮的兩個重要案例，並對其進行思想性的探討。本文分析指出：李、袁皆採取借古諷今、以史載道的言說策略，皆把歷史上的「漸進失敗」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政治激進主義」。實則，李、袁的政治言說皆立基於中國當下，且各有其獨特的政治關懷。李澤厚認為六四後中國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可能導致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袁偉時則把政治激進主義界定成一種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主張黨國集權的意識型態。本文並從「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視角指出：李、袁之極度強調「反激進」、「反革命」，帶來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言說效果。特別是，革命思想被凸顯為「漸進失敗」的最主要因素，甚至單一因素；其他制約漸進道路的政治社會因素，則未能得到同等的重視。

關鍵字：革命、政治激進主義、憲政、民主、聯邦制

壹、前言

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國共兩黨皆持正面評價。國民黨尊孫中山為國民革命的偉大領袖、中華道統的承繼者、中華民國的國父。按中共的革命史觀，孫中山則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先行者。¹ 儘管國共的革命史觀有所不同，但從「革命史觀」去肯定辛亥革命和孫中山，則一。

馬英九在 2011 年的元旦祝詞中表示：

中華民國的建立，向人民許下民主的承諾。……民國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國各地選出的制憲國大代表，結合中華文化與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亞洲最進步的民主憲法。民國三十八年內戰失利，大陸淪陷，政府遷台，……逐步在台灣實現中山先生的理想。六十多年來，中華民國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推動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並實現了政權和平輪替（馬英九，2011）。

對此說法，廣州中山大學的袁偉時（2011a）教授頗不以為然：「現在在台灣轉型，所有孫中山參照有特點的東西都失掉，但還是不能把孫中山這個偶像丟掉，所以另外塑造了一個孫中山，這個孫中山是民主的、自由的象徵」。他的言外之意：孫中山其實是反民主、反自由的。²

近二十年來，部分追求實現憲政民主、政治現代化的大陸論者，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革命行動進行重估，並得出不少否定性的評價。其中有些已

1 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先行者」評價孫中山的文獻繁多，可參見尚明軒（2008）。按中共革命史觀，辛亥革命的性質與法國大革命類似，都屬於進步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資產階級民主有其時代限制和資產階級屬性，故為更進步的 1949 年革命所超越。

2 在台灣，即使是在黨化教育的年代，民權主義也是必修課程之一。作為「民權」象徵的孫中山，因此不能說是馬英九另外塑造出來的。但袁偉時道破了國民黨「孫中山論述」的一大特色，就是比較關注作為符號的孫中山，而迴避了孫中山作為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過去，「國父」無論如何是不能針砭的。而在台灣民主化了以後，這方面的問題可以談了，卻乏人問津。

較爲人所知，例如：晚年孫中山所主導的國民黨改組，連同以俄爲師、聯俄容共、以黨治國等方針，雖使國民黨在蘇俄協助下起死回生，但也爲後來的蔣氏獨裁與中共崛起提供了條件。³ 此外，部分大陸論者進一步主張：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大錯誤，致使中國走不出穩健的君主立憲道路，而飽受不斷革命之苦。1990年代初，李澤厚提出他著名的「告別革命」論，把批判的矛頭指向「搞壞了」的辛亥革命。他表示：辛亥革命是孫中山等人執迷於「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的惡果；若非革命黨人從中作梗，君憲道路可能成功；辛亥革命必然造成軍閥混戰，乃至革命的不斷上綱，而孫中山對此難辭其咎（李澤厚、王德勝，2000 [1994]）。

在李澤厚的著名論點外，還有另一個相關的、但不盡相同的批評，亦即：執迷於革命的孫中山，須爲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的失敗，乃至後來聯省自治運動的夭折等，承擔主要的罪責。持這一批評的論者，又以袁偉時最爲著名。他認爲：孫中山是民初「政治激進主義」和「革命幼稚病」的主要代表；先是敗壞了民初憲政，後又斷送了聯省自治，最後把中國推向了以黨治國的深淵（袁偉時，2003a; 2006a; 2006b; 2006c; 2009; 2011a; 2011b）。

本文以「革命的幽靈」爲題，探究李澤厚和袁偉時的「反激進主義」觀點及其背後「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問題意識。需要強調的是，本文既不是關於孫中山評價，也不是關於辛亥革命或民初歷史，更無意於爲國共的革命史觀辯護。作者非史學專業，不擬深入歷史細節，而是把李、袁的政治言說視爲當代大陸反激進主義思潮的兩個重要案例，以展開思想性的探討。

本文把李、袁言說相提並論，主要是基於兩者的某些同構性。李、袁皆採取借古諷今、以史載道的言說策略，通過針砭歷史以強化其當下政治見解。兩者皆從「反激進」、「反革命」的視角去闡發「漸進」，並把歷史上的「漸進失敗」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所謂的「政治激進主義」。而無論是李澤厚對辛亥革命和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還是袁偉時對孫中山及其「革命幼稚病」的貶抑，皆出於「以漸進變革的方式實現憲政民主」之當下主張。

實際上，李、袁的政治言說皆立基於中國當下，且各有其獨特的政治關

3 另見高華（2010）、楊奎松（2008; 2010）的相關分析。

懷。李澤厚認為六四後中國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可能導致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理解為一種民主革命主義）；袁偉時則把政治激進主義界定成一種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主張黨國集權、與孫中山和中共相關的意識型態。這兩種對政治激進主義的理解，及其各自更具體的當下政治關懷，有著至為顯著的差異。因此，本文除了指出李、袁言說的同構性外，亦將對李、袁各自不同的當下問題意識提出說明。

本文並擬從「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視野，對李、袁的言說進路提出一項商榷。在本文看來，「漸進實現憲政民主」是個艱難的政治事業，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其在現實中所遭遇的阻力，不僅來自於所謂的政治激進主義，也還包括其他種種政治社會因素。李、袁之極度強調「反激進」、「反革命」，帶來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言說效果。特別是，革命思想被凸顯為「漸進失敗」的最主要因素，甚至單一因素；其他制約漸進道路的政治社會因素，則未能得到同等的重視。

後續各節的主要內容如下：第貳、參節分別對李、袁的主要論點進行歸納，並對其涉及之歷史爭議提出一些觀察；第肆節進一步分析李、袁各自的當下問題意識及其時代背景；第伍節則從「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角度，對李、袁的言路提出一項商榷；第陸節總結全文。

貳、李澤厚：「辛亥革命是搞糟了」

1990年代初，大陸思想界出現了一波「保守與激進」論爭。⁴ 那場論爭有兩個導火線：一個是余英時原發表於1988年的演講〈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另一個即是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論。余英時（2000 [1988]）的演講雖然也觸及政治上的保守與激進，但其主要的商榷對象是1980年代大陸啟蒙運動中的文化反傳統主義。⁵ 李澤厚則大力譴責「革命」和「政治

4 參見李世濤編（2000）所收錄之論爭文字。另見宋宏（2007）的分析，以及許紀霖、羅崗等（2007: 362-363）所列出之代表性文章目錄。

5 參見余英時（1992）對批評的回應。另見余英時等（1999）論五四，以及張灝（2004）論激進主義。

激進主義」，並把八九民運視為極端的激進主義。他認為「政治激進主義在 80 年代末被推到了極端」，因此需要疾呼「要改良不要革命」，並從反激進、反革命的角度「反省整個中國近代史」（李澤厚、王德勝，2000 [1994]: 77）。

一、告別革命論

李澤厚「辛亥革命是搞糟了」之說，接近於一種借古諷今，也就是藉由批評辛亥革命，以伸張「要改良不要革命」之當下主張。

李澤厚提出一種漸進變革的觀點：先經濟發展而有個人自由，再落實社會公正乃至政治民主（李澤厚、劉再復，1999: 346, 331-334）。⁶他表示，政治民主並非一蹴可得，而有其重要的實現條件。因此，他主張以漸進改良、和平進化的方式逐步實現政治民主，在漸變過程中不斷推進、壯大民主和法治（*ibid.*: 388-389, 338, 342-343）。他強調，他完全不贊同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因為後者主張把集權固定下來，因而「完全斬斷任何走向民主化的改良進程」。他堅持，「還是要向民主制度過渡」（李澤厚、王德勝，2000 [1994]: 75-76）。⁷

在實踐面上，他主張逐步落實法治；逐漸擴大履行人大和政協應有的職權，「逐步實現有限度但不斷擴大的民主權力」；同時不斷放鬆意識型態控制，逐漸擴大輿論和公民社會的自由度，逐步實現政企分離、黨政分離。至於反對黨制，則可以留到以後再說（李澤厚、劉再復，1999: 387-388, 337-338）。此外，孫中山民生主義的「均富」目標，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應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實現（*ibid.*: 152, 390）。以上，大體即是李澤厚所勾勒出的漸進民主化過程。

李澤厚表示：「早在 1978 年，我就提『法國式』與『英國式』之分。我贊成英國式的改良，不贊成法國式的、暴風驟雨式的大革命，這種革命方式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ibid.*: 94）。他對辛亥革命的看法如下：

6 李澤厚和劉再復的《告別革命》對話錄，原於 1995 年在香港出版。本文採用的是 1999 年的台灣版。

7 關於 1980 年代的新權威主義思潮，另見齊墨編（1991）。關於 1990 年代以降的新保守主義思潮，另見蕭功秦（1999; 2008）。

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清朝的確是已經腐朽的王朝，但在這個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義，寧可慢慢來，通過當時立憲派所主張的改良逼著它邁向現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軍閥混戰。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後，就是不斷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護法」、「大革命」，最後就是1949年的革命，並且此後毛澤東還要不斷革命（李澤厚、王德勝，2000 [1994]: 77）。

在這段廣受矚目的文字中，李澤厚除了表達他對革命、對政治激進主義的負面價值判斷外，還提出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而且「必然 [導致] 軍閥混戰」等因果論斷。在此，他把辛亥革命（及其「必然」後果如軍閥混戰、不斷革命等）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的激進主義意識型態。

李澤厚對孫中山的評價頗高，他認為孫的人格、精神和民主素養遠在袁世凱、蔣介石和毛澤東之上。孫中山「比同時代的革命者都更高地舉起了民主的旗幟」；但他「希望通過法國式的暴力革命方式來達到民主，而不選擇英國式的民主道路」，這就「不能說是正確的」（李澤厚、劉再復，1999: 148, 150, 149）。⁸ 照李澤厚的說法，當時中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孫中山的暴力革命道路；另一種是康有為、梁啟超所主張的君主立憲道路。他表示，如果選擇的是康梁的君憲道路，中國會好得多。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反而「促退」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ibid.*: 147-148, 371-375, 335）。

再者，辛亥革命也不是必然的。它不是歷史命定的，「不見得當時必然會發生」（*ibid.*: 373-375, 335）。

進而言之，戊戌變法「可能成功」，清末新政不必然失敗：「1908年以後，革命派勢力走下坡路，當時滿清政府已經公布了許多準備立憲的措施。當年立憲派的道路未必不能走通；並不一定非打破那個滿清政權，經濟才能夠發展，民主才能夠取得」（*ibid.*: 371-373, 335）。若非激進主義思潮深入人

8 另見李澤厚（1987）早先的孫中山評價。

心，加以不幸發生的歷史偶然，否則英國式的、康梁式的、君主立憲或虛君共和式的漸進道路可能成功。倘若辛亥革命不曾發生，君主立憲道路「未必不能走通」。

以上，即是告別革命論的幾個重要面向。一，它主張以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憲政民主。二，對革命、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持強烈的否定性評價。三，把辛亥革命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孫中山等人的激進主義思想，外加歷史偶然。四，稱若非革命從中作梗，君憲道路可能成功。

以下，我們將先對李澤厚的歷史論斷提出一些基本觀察。

二、漸進失敗的成因

李澤厚不是歷史學家。他關於辛亥革命的兩個論點（即「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外加歷史偶然）的結果」以及「君憲道路可能成功」）並未以史學研究的面貌出現，而主要是一種觀點闡發。實際上，李澤厚幾乎沒有引用任何史學研究的文獻，而是直接提出他的歷史論斷。

李澤厚說辛亥革命「不見得當時必然會發生」，這說法應可成立。張鳴（2011）在他的辛亥革命微觀研究中，即指出了一連串的偶發事件。在這些帶有偶然性的重要歷史環節之中，倘若有一兩個不曾發生，歷史軌跡就可能有所不同。比方說，如果某位關鍵人物不是在某個時間點上選擇了 A，而是選擇了也在他考慮範圍內的 B 或 C，歷史進程就可能發生變化。但當然，不選擇 A 而選擇 B 或 C 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細評估、推敲的。⁹

就戊戌變法而言，李澤厚聲稱它「可能成功」。但汪榮祖、余英時等史家的研究，卻指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變法敗因。汪榮祖（1992: 134）表示：「百日維新，康氏不僅不要推行激烈的君憲，而且擱置開議院的建議，他反而要增強君權以推行新政。爲了統籌新政，他只建議開制度局，至制度局不可開，他只要開早有成例的懋勤殿，已絕不可以言激烈，但仍被保守派包圍的慈禧太后否決，以致於發生政變」。就此來說，「戊戌變法的失敗，並不是

9 另見 Hawthorn (1991) 論「反事實推論」之於歷史理解的重要性。

思想趨向上的激進或保守，而是保守勢力爲了維護實際利益而拒變」。¹⁰

按余英時（1998: 7-9）的分析，戊戌變法不是突如其來，而是自強運動的局部變法一步步逼出來的。他認爲戊戌變法「必然失敗」：其中最根本的敗因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而這也可以「從權力分配和個人作用等方面」得到理解。他強調，滿清統治集團爲了維護「一族專政」而拒變，才是變法的關鍵敗因。

新保守主義者蕭功秦（1998; 1999）也認爲戊戌變法幾乎注定失敗，但將此歸咎於「政治激進主義」。（按：此與李澤厚批判辛亥革命的邏輯，可謂如出一轍。）從新保守主義的視角，康梁的「政治激進主義」挑戰了現任權威集團的核心利益，亦即：權威集團認定百日維新構成了政治威脅。¹¹此與汪榮祖、余英時以上分析，可謂殊途同歸，儘管責難的對象有所不同。汪、余指向慈禧集團頑固拒變，蕭功秦則譴責康梁不尊重權威。

清末新政是君憲道路的另一次機會。庚子事變後，清廷在內外壓力下推動、主導新政。這一新政的具體內容，比起康有爲的戊戌方案要激進得多。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1906年，下詔仿行立憲；1907年，下令籌設資政院和各省諮議局，並準備籌設府州縣議事會；1908年，頒布憲法大綱；1909年，宣示實行預備立憲，各省諮議局開幕（張朋園，2005: 4-5）。諮議局開幕後，各省立憲派仕紳有了政治舞台，旋即於1910年發起三次國會請願，要求縮短預備立憲年限，早開國會，謂「無國會則所謂籌備者皆空言」。長期研究立憲派的張朋園指出：立憲派三次請願，清廷一再不准；加以資政院民選議員彈劾軍機，與清廷對立的緊張態勢一度出現。然立憲派性本溫和，第三次請願不成，遂各歸故里（ibid.: 69, 89）。孰料清廷安排皇族內閣，並欲收回路權。金觀濤和劉青峰（1993: 140-146）所謂「紳權與王權的對抗」遂愈演愈烈。

武昌起義後，對革命素無好感的各省立憲派仕紳紛紛出面響應。例如，湖北立憲派領袖湯化龍冒著抄家滅族的風險，第一時間即出面支持起義方，

10 另見汪榮祖（1983）論晚清變法思想；汪榮祖（1998）、蕭公權（1988）論康有爲。

11 另見馬勇（2001a）。

率湖北仕紳穩定局面（張鳴，2011：48-52）。照張朋園（2005：108）的分析，「辛亥革命爆發時，憲友會成立雖僅三數月，然已有相當基礎。他們在革命中採應變手段，控制各省政局，革命形勢幾爲之操縱。立憲派人始求於國會，終於得革命，種瓜得豆」。¹²

綜上，如果汪榮祖、余英時、張朋園等史家的研究有重要性的話，這些研究似乎並未強化李澤厚「戊戌變法可能成功」、「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的結果」等說法，反而凸顯出他所忽略或低估的另一些歷史面向。

如果辛亥革命不會發生，清末新政所引發的王紳衝突得以暫時化解，中國又能否走出成功的君憲道路？對此，李澤厚給予了肯定的答案，但他並未援引任何史學研究以支持他的說法。諸如既得利益者頑固拒變（余英時、汪榮祖）、滿清政府的利害認知（余英時）、新政所引發的社會變化和王紳衝突（張朋園、金觀濤、劉青峰）等革命思想以外的其他政治社會因素，在李澤厚的反激進主義言說中，並未被納入考量。

參、袁偉時：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

按李澤厚的說法，辛亥革命「必然」導致軍閥亂政和不斷革命。反之，袁偉時的推斷則是：雖然辛亥革命是「一個得不償失的革命」，¹³但在辛亥之後，中國仍可能建立相對穩定的憲政和議會政治；而即使後來形成了軍閥割據，聯省自治道路也仍然走得通。袁偉時痛斥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未致力於民主法治建設，反而一再訴諸武力，不斷革命。他把民初憲政之失敗、聯省自治之夭折，皆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孫氏的「革命幼稚病」和「政治激進主義」。

12 另見黃克武（2011）論台灣學界的辛亥革命研究，特別是立憲派研究及其意義。按國共兩黨的革命史觀，立憲派是反革命的封建勢力；辛亥革命的系譜始於孫中山創立的興中會，此後革命黨人屢敗屢戰，歷經多次起義而終獲成功。但自1960年代以來，辛亥革命研究最具突破性的發展，即是張朋園（1964；2005）等學者對立憲派角色和歷史分量的重新估定。

13 「一個得不償失的革命」一語，出自袁偉時（2009）。袁偉時的孫中山相關文章與訪談，多於互聯網上直接發布，尚未集結成書。故引文的頁數往往無法標識，因其取決於字體大小。

一、袁偉時的主要論點

袁偉時在他 1990 年代以降的著作中，愈發凸顯出他對法治、憲政、自由、民主、個人權利、聯邦制的堅持。他認為中國現代化之挫敗，最深層的原因在於思想變革不徹底，在於「中世紀意識型態」的束縛。因此，他高度肯定（早期）新文化運動的啓蒙貢獻（袁偉時，2006a）。¹⁴

在 1990 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大潮中，袁偉時屬於堅持思想啓蒙、繼續批判文化保守主義的少數、異數。他更多的承繼了大陸 1980 年代的啓蒙精神，要求對傳統文化的負面因素進行清理（袁偉時，2000）。¹⁵ 他呼籲繼續推動思想啓蒙，「讓中國人確立公民權利、個人自主自由、司法獨立和法治、憲政、軍隊國家化和軍人不得干政的觀念，為民主共和制度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礎」（袁偉時，2006a）。

袁偉時強調民主政治是「逐步生長出來的」。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在任何國家都需經過長期的努力，故不能以「國情特殊」或「國民素質低下」作為拒絕實現民主的藉口。再者，腐敗和混亂「只能通過民主、法治去糾正和防止」；武裝革命「只能實現權力轉移，不是清除污穢的手段」。他指出：「除了分權制約、民主監督和法治之外，沒有其他可以根治的有效藥方。民主、法治自身有強大的糾錯能力，離開這個機制，必然走入歪門邪道」（袁偉時，2011b）。這是一種「以民主推進民主，以法治推進法治」的漸進思路（袁偉時，2009）。

袁偉時並非歷史學家。他近年來的歷史評論，也是出於當下的政治關懷；後者包括思想啓蒙、告別中世紀意識型態、以民主推進民主、以法治推進法治、聯邦制等。和李澤厚一樣，袁偉時亦對革命、革命幼稚病、政治激進主義等，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近十年來，袁偉時針對孫中山做出了一連串否定性的評價。儘管他表示

14 另見袁偉時編（2004），以及袁偉時（1987; 1992; 1998a; 1998b; 2000; 2003b）的較早期著作。

15 另見袁偉時編（2004）。並對照李世濤編（2000）的其他論爭文字，以及李澤厚、李緒源（2011）。

民初「所有各派的政治領袖，都犯了重大的錯誤」，但孫中山無疑是他最主要的批判對象（袁偉時，2003a）。在今日大陸，袁偉時堪稱「否定孫中山」最力的自由派論者。包括孫中山的「個人品德」在內，也都在他的批評之列。他強力譴責孫氏幾無法治觀念，一再爲了革命而踐踏法治；還不斷向列強行乞，不惜出賣滿蒙；最後引俄入室，致使中國走上以黨治國的錯路（袁偉時，2006a）。

以下不擬細究袁偉時所有的孫中山論點，而將集中於他的兩個主要說法。第一，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的失敗，係以宋教仁被刺案爲轉捩點；當時孫中山做出了錯誤的決斷，致使袁世凱失去制衡（袁偉時，2003a; 2006a; 2006b; 2006c; 2009; 2011b）。第二，若非孫中山從中作梗，1920年代的聯省自治運動未必走不通（袁偉時，2000; 2003a; 2006b; 2006c; 2008; 2009）。這兩個說法皆把「漸進失敗」（憲政失敗、議會失敗、聯邦失敗等）主要歸咎於孫氏的「政治激進主義」。

民國元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孫中山一度表示「民族」與「民權」問題已經解決，因此投入「民生」，即實業計畫。以國民黨議員佔大多數的國會之運作，以及臨時約法的制訂，則交由宋教仁主持。次年3月宋教仁被刺後，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結果迅速失敗。孫氏在黃興的反對下，堅持另建中華革命黨，並要求黨員按指印以宣示效忠。以梁啟超爲精神領袖的進步黨，以安定爲由倒向袁世凱。袁世凱把國民黨打成非法，一舉摧毀了國會，大總統獨裁的格局遂告出現。

這些基本史實，爭議不大，關鍵在於如何解釋。按正統革命史觀，罪過都在袁世凱及其他「反革命」身上。袁偉時則欲證明：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之失敗，孫中山實難辭其咎。他的說法可歸納如下：

首先，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乃勢之必然，但國民黨人不信任袁氏，遂把總統制改成內閣制。此種因人設事的修法及其效力，本身即值得懷疑。再就臨時約法的內容而言，它有五大問題：總統制或內閣制，不夠明晰；沒有確切保障公民自由；國會與總統沒有互相制衡的機制；總統和總理的關係不明確；沒有建立違憲審查制度（袁偉時，2011b）。不過，這些問題還不是關

鍵性的。¹⁶

關鍵的轉捩點是孫中山對宋教仁被刺案的反應。本來，「『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勢對國民黨非常有利，兇手抓到了，作為鐵證的來往電報拿到和公布了」（袁偉時，2006b）。

從袁世凱到民間各方，宋案應由法院解決的態度非常鮮明。如果珍惜這個機會，中國的法治有可能逐步走上軌道。不幸，國民黨內的極端派，跳不出革命年代養成的槍桿子定是非的窠臼，一意孤行，悍然發動「二次革命」，不但國民黨墮入失敗的深淵，袁世凱也失去制衡而滑向從專制到稱帝的死亡道路（袁偉時，2011b）。

在此，袁偉時做出了幾個不同層次的論斷。其一，如果孫氏尋求以法律途徑解決，國民黨當不至於迅速潰敗。其二，孫氏發動二次革命而使國民黨潰敗，須為袁世凱之失去制衡、獨裁乃至稱帝負責。其三，若非孫氏發動二次革命，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可能成功。

1916年袁世凱死後，軍閥割據勾結愈演愈烈。國會復會不多久，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隨之而來的是張勳復辟。孫中山遂發起護法鬥爭，以「護法」、「除盡假共和」之名，在廣州成立軍政府。對此，袁偉時（2006c）提出五點批評：在民主恢復在望之際，建立非法的軍政府；公然踐踏法治；玩弄無效的政治遊戲；助長政治瘟疫（賄選、暗殺、動用槍砲）；在總統選舉中罔顧法紀。

袁偉時（2003a）指出：孫中山廣州國民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包括黨化司法、黨化教育、領袖的最後決定權等，正是後來蔣介石南京國民政府以黨治國的政策前身。按中共說法，國民黨的專制轉向是1925年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挾北伐勝利之勢，在1927年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所形成的。袁偉時

16 以上問題還不是關鍵性的，因為「辛亥革命後，三權分立體制在中國開局有良好的一面。例如，當時的法官儘管數量不足，但整體上敢於堅持司法獨立」；「各級議會和在野黨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也是毫不容情的」；「由於言論出版自由，不少報刊也堅持了自己的獨立品格，加上公民社會強大，當時的腐敗一一被揭諸報端」（袁偉時，2011b）。

(2006c) 則認為，南京政府延續、繼承了孫中山廣州政府的以黨治國方針。

袁偉時強烈反對北伐統一。照他的陳述，1920年代中國在軍閥割據的情況下，有兩個可能的出路：一個是孫中山所主張的北伐統一、中央集權、以黨治國道路；另一個是聯省自治。陳獨秀等人支持孫中山的武力統一路線，而胡適等人則支持陳炯明、趙恆惕、唐繼堯等地方實力派的聯省自治運動（袁偉時，2000: 266-267）。後者

是當時中國最好的一個選擇。過去說，聯省自治運動不足取，說它是為軍閥的割據提供依據。這是猜測性的說法，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聯省自治是當時全國規模的運動，有的已付諸實踐。這一運動通常有四方面的內容：1，制定省憲，實行自治；2，宣布不參與內戰，與各省和平相處；3，致力於本省的經濟、文化建設；4，在各省自治的基礎上，成立中央政府（袁偉時，2003a）。

聯省自治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反而是國民革命取得了勝利。在袁偉時看來，這個勝利讓中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尤其是孫中山幾乎完全仰賴俄國的援助，而把黨國專制引入了中國。但「要是當時的十七、八個省支持聯省自治的局面發展下去，中國就會變成一個聯邦共和國，那樣國家就會穩定」（袁偉時，2009）。

孫中山的另一罪責因此在於：他斷送了漸進的聯省自治道路，埋葬了聯邦共和的契機。他的「革命幼稚病」把中國推向了黨國專制和反覆不斷革命的深淵。

二、「革命幼稚病」及其他

在孫氏「思想觀念的迷誤」和「個人品德的缺陷」之外，袁偉時亦表示「更應重視的是社會環境」（袁偉時，2006a）。換句話說，袁偉時並未否認民初的社會環境不利於民主法治的穩定發展。但他仍把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之失敗，連同聯省自治運動之不成，主要歸因於孫氏「思想觀念的迷誤」。以下，我們亦將先對袁偉時的歷史論斷提出一些基本觀察。

袁偉時表示：如果國民黨尋求以法治途徑解決宋教仁案，民初憲政當不至於急轉直下。亦即，如果孫中山選擇了法律途徑而非二次革命，國民黨可能就不會迅速潰敗，而袁世凱的集權傾向就可能遭遇更多阻礙。本文不擬否認這一歷史可能性。¹⁷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順利當上正式大總統，取得了獨裁專制的權力，並祭出種種法律以整肅異己、箝制言論。因為大權在握，且有德高望重的士林大老（如籌安會六君子）出面支持，袁世凱走向了稱帝之路。但袁偉時稱：是二次革命使袁世凱「失去制衡而滑向從專制到稱帝的死亡道路」，因此，孫中山須為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之失敗負責。

然而，如袁偉時自己所指出：二次革命得不到輿論支持，以至於兩個月內就徹底失敗；還奉送給袁世凱一個口實，乾脆藉此整掉國民黨，並解散國會。易言之，孫中山作為失敗的、遭到邊緣化的一方，對此後袁世凱所主導的政治發展（解散國會、大總統獨裁、稱帝等）幾乎施不上力。若然，則稱孫中山須為袁世凱之「不受制衡」乃至稱帝負責，就難稱合理。¹⁸

袁偉時（2006a; 2006b; 2011b）強調：如果沒有二次革命，民初憲政可能成功。但就連他自己都表示：「當時的中國社會該死的未死」，現代民主與法治「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2006a）。這個更公允的說法暗示：在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之外，應該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共同導致了憲政失敗、議會失敗。

袁偉時關於聯省自治的論點，除了肯認聯邦制的可欲性外，還極力強調聯邦制在當時情況下的可成功性。包括胡適、梁啟超、章太炎，也包括 1922 年陳炯明事件以前的陳獨秀，都曾支持聯省自治。¹⁹ 晚近，袁偉時（2000; 2003a; 2006c; 2008; 2009）亟欲為陳炯明平反，稱陳氏係因主張聯省自治、

17 另見許紀霖（2011）的相關論點。

18 袁偉時（2006b; 2011b）把袁世凱的罪惡歸為「暗殺」和「稱帝」兩項。由於孫中山也搞暗殺，袁氏的特別罪過遂變成了「稱帝」一項，而後者又被歸因於孫中山搞二次革命而使袁氏「失去制衡」。相對於袁偉時，部分史家的另一種說法是：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這三股重要勢力對憲政、對法治的「規範認同」皆嚴重不足。從這個角度，孫中山當然有責，但袁世凱和梁啟超也在責難逃。參見張朋園（2006: 第 3 章）、金觀濤、劉青峰（1993: 173）、許紀霖（2011）。

19 參見馬勇（2001b）的相關分析。

反對中央集權而與孫中山不合；但孫氏的武力統一路線是錯誤的，陳氏的聯省自治才是正確道路。²⁰ 實則，胡適當年也有類似說法：主張聯省自治，不是要放任軍閥割據，而是要以和平方式實現（聯邦式）統一。²¹

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年輕人，在 1920 年代中期大舉投向國民革命。從 1919 年梁啟超論述聯省自治，直到 1926 年蔣介石發動北伐，「聯省」自治始終裹足不前。²² 袁偉時訴諸陳炯明、趙恆惕等地方實力派的「省憲」構想與實踐，稱「聯省自治是當時全國規模的運動，有的已付諸實踐」。但這是關於「自治」而非「聯省」。從他自己所舉出的史料來看，「聯省」自治直到孫中山死前，或蔣介石發動北伐以前，都仍是雷聲大雨點小（袁偉時，2003a; 2006c）。孫中山廣州政府的武力統一路線，在他生前仍看不出多大的成功希望——「軍事上固然一無所得，政治上輸得更慘」正是袁偉時的評語（2006c）。後來蔣介石北伐之勢如破竹，也多在時人的意料之外。²³

綜上，袁偉時把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之失敗、聯省自治運動之不成，都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孫中山的「政治激進主義」和「革命幼稚病」。但即使從他本人的論述張力中，我們都不難察覺：在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之外，「漸進失敗」（憲政失敗、議會失敗、聯邦失敗等）應該還有其他重要的政治社會成因，包括憲政法治先天不足（社會基礎薄弱、思想觀念滯後）後天失調（惡性政治鬥爭）、袁世凱的專制復辟、各省軍紳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政治整合危機等因素。

20 袁偉時（2000; 2003a; 2006c; 2008; 2009）。另見陳定炎編（1995）為陳炯明翻案之作。

21 參見馬勇（2001b）對聯省自治「理念」論述之分析。

22 梁啟超於 1919 年〈解放與改造發刊詞〉首度提出「聯省自治」。另見張朋園（2006: 212-221）的相關分析。

23 梁啟超（2011 [1927]: 57）在 1927 年 5 月 5 日的一封家書中提到：「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占領，哪一役不是靠蘇俄人指揮而成功者！」

肆、當下問題意識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界即已開始重估「反革命」。1990年代以降，則不斷有更多昔日的「反革命」人物和思想，在學術研究或歷史評論中得到翻案。在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之外，重估對象還包括清末民初的立憲派、自強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自由主義、第三勢力、新文化運動等，不一而足。儘管革命史觀的辯護者仍所在多有，但昔日那種成王敗寇的、帶有歷史命定論的革命史宏大敘事，已經相當程度被鬆動了。這印證了義大利哲人克羅齊的那句話：「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論者們出於不同於以往或彼此的問題意識，對歷史提出不同的詰問，也因而產生不同的歷史見解。在這方面，李澤厚和袁偉時皆有其「提出新的問題意識」的貢獻。

李、袁皆非史學家。他們之所以針砭歷史，主要是想通過對歷史上「革命」和「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以強化、確立「反激進」、「反革命」、漸進實現憲政民主、聯邦共和等政治價值。以下，我們將對李、袁言說的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提出進一步分析。

一、時代背景

1989年的六四事件，是大陸改革開放過程中的一個分水嶺。八九民運始於紀念胡耀邦，終於軍事戒嚴和鎮壓。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大陸進入了新一輪的經濟改革開放。鄧小平的所謂「兩手硬」，一手「發展就是一切」，一手「穩定壓倒一切」。1992年後的高速經濟增長，即是以鞏固一黨專政作為政治前提。國際學界稱之為一種「後極權」：其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與新的市場經濟相適應，並成為其推動力；在政治上，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繼續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由「兩手硬」所型塑出來的所謂「中國模式」，在創造經濟增長奇蹟的同時，極力抗拒政治上的和平漸變。此種拒變的政治邏輯，晚近顯現在不斷增加的維穩開支。

同樣在1992年，大陸思想界開始出現一波「激進與保守」論爭。最初觸發那場論爭的余英時1988年的演講，本來主要是關於文化上的激進與保

守。但隨著論爭的展開，除了文化上的激進與保守，關於政治上的激進與保守的文字也紛紛出現；但後者主要環繞著清末民初的歷史爭議，而鮮少直接碰觸中共的政治禁忌。²⁴ 在六四後的氛圍下，一般認為是「反思激進主義」的一方占了上風（宋宏，2007）。1990年代後期浮出水面的大陸自由主義思潮，也帶有「反思激進主義」的重要一面。²⁵

中共以革命起家，至今仍堅持其革命史觀和革命意識型態；因此，部分大陸自由派論者之「反思激進主義」，經常暗示著對中共的批評。於是，1990年代的激進與保守論爭，呈現出兩種不同語境的交叉現象。一種語境是：通過對激進主義的反思，間接表達對中共體制及其革命意識型態的不滿。或更確切地說，因為直接批評中共仍是禁忌，才選擇以借古諷今、以史載道作為言說策略。另一種語境則與六四有關，帶有「反思六四」、「在六四之後尋找出路」的問題意識。1990年代初期的激進與保守之爭，一開始無疑是在六四陰影下出現的。李澤厚和袁偉時之介入論爭，與此息息相關。

在1990年代「反思激進主義」的各股言說中，李澤厚「告別革命」論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明確地批判八九民運，並把六四事件主要歸咎於學生的「政治激進主義」，而未將「當局還有其他選項，不應軍事鎮壓」的觀點也納入考量。大多數其他「反思激進主義」的論者，包括余英時、袁偉時等，則並未做出李澤厚式的六四論斷。由此不難看出，即使是漸進主義者，言說進路仍不盡相同。

本文一方面指出李、袁言說的某些同構性。但另一方面，李、袁之間也存在著顯著差異。實際上，袁偉時經常被認為是一位「激進」的自由民主和聯邦共和論者；因為他對孫中山的口誅筆伐，連同以思想啓蒙破除「中世紀意識型態」的言路，幾乎都暗示著對六四後大陸政治現狀的嚴厲批評。再由於公開討論「聯邦制」仍是政治禁忌，袁偉時及部分自由派論者對聯省自治運動的「平反」，無疑也是一種「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24 參見李世濤編（2000）所收錄之論爭文字，以及許紀霖、羅崗等（2007: 362-363）所列出之代表性文章目錄。

25 關於1990年代後期以降的大陸自由主義及其與新左派的論爭，另見許紀霖、羅崗等（2007: 362-398）所列出之代表性文章目錄；王超華編（2004）。

李、袁在 1990 年代的激進與保守論爭中登場之後，迄今並未改變其主要看法。²⁶ 但今日，大陸廣義的政治自由主義陣營的辯論狀態及其發生背景，已與 1990 年代初期有所不同。約自 2008 年北京奧運前後，隨著維穩力道的繼續加強，群體性事件的不斷增加，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和黨內呼聲開始升高。在晚近關於政治改革的論爭中，無論是所謂的「激進派」（此指民主革命派而非毛左派），還是寄一定希望於中共啓動政治改革、釋放社會空間、平反趙紫陽和六四的「漸進派」，都已經出現了對政治變革的高度期待。這是 1990 年代所沒有的新現象。

二、李澤厚的問題意識

照李澤厚的陳述，「政治激進主義在 80 年代末被推到了極端」。因此，他認為極有必要從反激進、反革命的角度「反省整個中國近代史」。而他從中國近代史特別挑出來作為批判對象的，主要就是辛亥革命。中國在 1989 年後「好些方面酷似上世紀末辛亥之前，只是還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黨罷了，但極端不滿現狀，渴望『推倒重來』的革命情緒、願望、意欲、主張甚至理論，在年輕的知識群中卻大量地、深深地潛伏著、存在著、發展著」（李澤厚、劉再復，1999: 379）。在六四之後，東歐和蘇聯的共產政權相繼崩解。李澤厚對中國可能發生類似革命的憂慮，跟這個歷史大背景是有關的。

林毓生曾經表示：李澤厚說「要改良不要革命」，但這只是馬後砲而已，因為改良早已是共識，重點在於如何改良、朝什麼方向改良。李澤厚則回應：中國社會（此指 1990 年代）仍有革命情緒，因此，告誡「不要革命」是馬前砲而不是馬後砲（*ibid.*: 341）。由此觀之，即使在主張漸進改良的論者當中，都仍存在著一些判斷上的重要差異。李澤厚基本認為，六四後中國的最大危險在於極度不滿現狀、渴望推倒重來的革命心態。但其他漸進論者如林毓生，卻不同意單單固著於這一面向。

事實上，李澤厚並非不討論如何改良，以及朝什麼方向改良。關於此點，第貳節已有歸納，此處不贅。可以說，李澤厚的改良主張承繼了 1980 年代

26 對照李澤厚（2011）。

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探討，時至今日也仍有其意義。鄧小平在 1980 年代兩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都無疾而終。然而，1986-87 年間趙紫陽所主導的政治改革研究，已包含了李澤厚的大多數改良建議。諸如黨政分開、人大選舉改革、輿論自由慢慢放開、社會自主空間的擴大等，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即被提出，只是未能付諸實現，在六四之後更被束之高閣。²⁷

李澤厚之所以全盤否定辛亥革命，本是出於「要改良不要革命」、「漸進實現憲政民主」之問題意識。而他最主要的當下政治關懷，即在於避免革命之發生。正因如此，他對「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闡發，跟余英時、林毓生、袁偉時都有所不同。最大的不同在於：李澤厚在主張漸進的同時，極度強調中國的最大危險是可能導致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

李澤厚關於辛亥革命的「偶然性」的論斷，蘊含著某種特定的政治理解：單單「激進主義思潮」本身未必會導致革命，但在偶發事件的配合下則可能導致革命。如果「激進主義思潮」的影響力能夠受到抑制，那即使遇到了政治或經濟危機，也不會動輒爆發革命。在此，「激進主義思潮」被理解為革命的重要條件。順此邏輯，李澤厚認為有必要不斷批判「激進主義思潮」，以預防其在危機時刻導致革命。

李澤厚關於「激進主義思潮」的因果作用力、辛亥革命的偶然性，連同戊戌變法和君憲道路「可能成功」、「不必然失敗」的論斷，都是在比較抽象的理論層次上進行的。他最主要的當下政治關懷是「要避免革命」，並由此建立「反對政治激進主義」的言說重心。通過「反激進」、「反革命」，他樹立了「漸進」的政治認同。然後，把「漸進 vs. 激進」進一步演繹為清末「君憲 vs. 革命」之爭，以及「英國式 vs. 法國式」的對立。他試圖通過這些借古諷今的史論，以強化「革命對中國有害無利」、「漸進道路可能成功」等當下政治見解。

李澤厚在「當下」和「歷史」之間的雙向互動，涉及兩個不同的歷史和政治脈絡：一個是清末民初；另一個是六四後的大陸。這兩個不同脈絡能否「互譯」，仍存在著一些疑點，或仍有一定的討論空間。在今日大陸，「漸進

27 參見高放（2006）論政治體制改革。

實現憲政民主」所面臨到的主要問題，是從 1949 年發展迄今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能否逐漸憲政法治化和自由民主化的問題。此種所謂的「後極權」體制，顯與清末政治體制有所差異。

但我們不妨先假設兩個不同的歷史脈絡可以互相對照，並假設李澤厚已成功說明了「戊戌變法可能成功」、「君憲道路不必然失敗」。在李澤厚的言說當中，這些史論的主要作用在於強化「在當前和未來的中國，漸進的民主化道路可能成功」的言內和言外之意。然而，這本身似乎不是一個很強的論斷。因為大多數希望大陸能夠「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人，應該都不會同意「漸進道路必然失敗」，且大都接受「漸進道路可能成功」。

換句話說，李澤厚通過借古諷今所欲樹立的「漸進道路可能成功」之說，最主要仍是出於「六四後中國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可能導致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之問題意識。如前所述，此與他對六四後中國的特定政治判斷有關，亦構成他企欲否定「革命」和「政治激進主義」的言說出發點。

三、袁偉時的問題意識

和李澤厚一樣，袁偉時主張以漸進變革的方式實現憲政民主，並以「政治激進主義」作為主要的批判對象。儘管李、袁的史論有互相衝突之處，兩者皆把歷史上的「漸進失敗」歸因並歸咎於「政治激進主義」。²⁸

但在此之外，李、袁之間的差異不但顯著，且經常被賦予不同的解讀。袁偉時在學生時期曾參加中共地下黨；在六四之後，他成為中共體制的堅定批評者。他對孫中山的諸多批評，包括革命幼稚病、無法治觀念、欠缺自由民主素養、黨國集權傾向、思想觀念的迷誤、品德缺陷等，很自然地讀成是對中共的批評。²⁹ 在六四之後，他亦屬於堅持繼續思想啓蒙的少數。

28 如第參節所指出，李、袁史論的衝突之處在於：李認為辛亥革命必然導致軍閥混戰和不斷革命，袁則強調辛亥革命後的亂局可以避免。

29 在晚近大陸的「民國熱」中，部分論者強調：他們所肯定的民國，是孫中山聯俄容共之前的民國，或蔣介石北伐統一之前的民國，而不是後來走向黨國集權的民國。持這類觀點的論者，往往有著堅定的反共和反集權意識，且對當前大陸的政治現狀多所批評。可以說，袁偉時正是其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

對袁偉時而言，當前大陸的最主要問題在於思想觀念變革的不徹底。因此，他從現代憲政法治、自由民主、個人權利、聯邦共和等理念出發，查找清末民初諸多重要人物（包括嚴復、康梁等）之思想缺失（袁偉時，1992; 1998a; 1998b）。近年來，他則特別針對孫中山展開批評，企欲通過對孫氏「思想觀念的迷誤」的斥責，以肯認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的當下政治意義。相對於批評嚴復或康梁，批評孫中山無疑帶有更直接的當下指涉性。

袁偉時以當代自由民主理念作為基準，對孫中山和國民黨多所責難。在這些責難當中，最具袁偉時特色的一項，莫過於他從聯邦制的理念平反聯省自治運動，並把聯省自治之不成歸咎於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實際上，並非所有的大陸自由民主論者都支持聯邦制。袁偉時則強力主張地方高度自治的聯邦制，並通過對聯省自治運動的翻案，以強化「中國應實現聯邦制」之政治見解。和李澤厚類似，袁偉時亦認為「歷史」與「當下」是可以互譯的。

聯省自治運動之失敗，袁偉時將其主要歸咎於孫中山的政治激進主義。對部分（並非全部）大陸自由派論者來說，正如同對早期的孫中山來說，美式「聯邦共和」是某種終極的中國政治想像。〈零八憲章〉之提倡內地聯邦制，而不僅僅把聯邦制視為解決藏維問題的可能方式，或可追溯到興中會「創立合眾政府」的秘密誓詞。³⁰ 民國以降，孫中山逐漸遠離聯邦制，轉而構思以縣為單位的地方自治。在今日廣義的大陸自由民主論者中，也有主張縣級地方自治（吳國光，2004）或州級地方自治者（陳子明，2005）。但提倡聯邦制者不在少數，如〈零八憲章〉、袁偉時、劉軍寧（2002）等。

杜贊奇（Duara, 1995: ch. 6）曾指出：陳獨秀等以反對軍閥割據之名反對聯省自治，忽略了聯省自治不等於軍閥割據，而是另一種可能的、有意義的國族想像。後者反對大一統，是希望在全省高度自主的基礎上，獲致聯邦式的統一。大體而言，這正是袁偉時的基本信念。他認為國民革命之得到支持，跟民族主義和大一統思維有關（袁偉時，2000: 266）。但「你去看某一個省的歷史，都會講到當地的軍閥做過很多好事。我不知道湖北怎麼樣。到

30 另見李曉蓉、張祖樞編（2009）《零八憲章》及其討論。

山西，都講閻錫山好，廣東呢，都講陳濟棠好」(袁偉時，2009)。³¹他質問：「統一是不是最高仁政？統一不是最高仁政。民眾的福祉、公民的自由、公民的福祉才是最高原則。爲什麼一定要統一？不統一行不行啊？」他表示：「我贊成統一，但是這個統一通過什麼？民主的方式來統一，和平的方式來統一，如果是那樣就很好，聯省自治就是這樣」(袁偉時，2003a)。

就中國大陸來說，袁偉時的聯邦制理念能否實現，無疑仍是未知數。自朱鎔基時代以降，分稅制以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走向，使中央集權得到了鞏固。今後，如果要改變這種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勢必牽涉到富省與窮省之間的重分配問題，以及如何面對、克服大一統思維的問題。相對於「從大一統過渡到聯邦制」的未來政治圖像，民初的情況則是「從軍紳集團的分立過渡到大一統」。這兩種不同的歷史脈絡可否通約共量，或仍有一定的斟酌空間。但袁偉時反對大一統，主張聯邦共和的基本立場，則一以貫之。

綜上，袁偉時通過針砭歷史所欲樹立的「民主憲政可能成功」、「聯邦制可能成功」之說，主要是出於他所堅持的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以及「中國需要徹底的思想觀念變革」、「中國應走向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等當下政治關懷。對他來說，「政治激進主義」不是民主革命主義，而是他的政治理念的對立面，是一種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主張黨國集權的、與孫中山和國共有關的「中世紀意識型態」。

伍、評估與商榷

李、袁的政治言說皆立基於中國當下。李澤厚從「中國應避免革命」的當下政治見解出發，通過歷史與當下之間的來回對照，以強化「革命有害無利」、「漸進道路可能成功」等主張。袁偉時則從思想啓蒙的視角，訴諸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並通過以史載道的言說策略，以肯認中國「需要徹底的思想觀念變革」、「應實現自由民主和聯邦共和」。

本文對李、袁言說之考察，主要是出於分析、理解的旨趣。但在肯定他

31 另見胡春惠(1983)論聯省自治；陳志讓(1979)、張鳴(2008)論民初軍閥勢力。

們的貢獻的同時，在同情的理解之外，仍不完全同意他們的言路。在作者看來，李、袁過於單面向地從「反激進」、「反革命」的角度去闡發「漸進」。影響所至，在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之外，其他制約漸進道路的政治社會因素，或者變得隱而未顯，或者變成了配角。

一、漸進實現憲政民主

本文所謂的「漸進」和「漸進道路」，係指朝向憲政民主的漸進；「漸進主義」則指尋求以漸變方式實現憲政民主之主義。顯而易見，並非所有的大陸論者都認為中國應該走憲政民主道路；而不同意這一目標的人，很可能既反對民主革命，也反對漸進民主化。易言之，本文所觸及到的漸進與激進論爭，主要是大陸廣義的政治自由主義陣營的內部辯論。在此脈絡下，無論是激進派還是漸進派，都接受以憲政民主作為政治目標。

李、袁主張以漸進變革的方式實現憲政民主，本文亦接受、支持這一立場。在作者看來，晚近跨國民主轉型研究的基本洞見即在於：「民主過渡」不等於「民主鞏固」，而「民主鞏固」也不等於憲政民主的成功實現。從威權體制過渡到選舉民主，是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共相。但即使選舉的遊戲規則得到了各方接受，而並未倒退回威權體制（按：此乃「民主鞏固」的核心定義），這仍不等於就實現了成功的憲政民主。在今日世界，不自由、低自由或半自由的選舉民主，或有選舉而無憲政的所謂民主，仍比比皆是。而這意味著：所謂「民主過渡」和「民主鞏固」，往往仍不足以締建出相對「成功的」憲政民主。³²

從後發國的民主轉型經驗來看，成功的憲政民主很難一步到位，而有其一定的實現條件，需要在漸進的過程中逐漸發展成熟。「有利於憲政民主健全發展」的條件究竟包括哪些，至今仍具爭議性，但大致包括（例如）教育水準的普遍提高、信息傳播渠道的自由多樣、市民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基本權利的落實、權利意識的抬頭、貧富差距的縮減、社會公正的漸進實現、憲政法治程度的提升、政治文化的進步轉變、公民意識和素養的漸趨成熟、

32 另見陳宜中（2011: 268-274）的分析及其引用文獻。

族群或民族衝突的緩解，等等。這張清單該如何開列，取決於論者們對「成功的憲政民主」的成功標準及其實現條件的判斷；以上所列只是一種參考而已。重點在於：憲政民主的成功實現無法一步到位，而有賴於種種有利的實現條件的開創和養成。在其實現條件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即使爆發了民主革命或出現了民主過渡，也不太可能帶來相對穩健成功的憲政民主（陳宜中，2011: 273）。

「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道路在大陸能否走得通，至今沒有任何人能有把握。六四之後，在中共嚴防政治鬆動的情況下，漸進道路的大門迄今仍未打開。儘管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日漸升高，但目前為止，中共仍持續鞏固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新興社會力雖多少有了一些成長的縫隙，但「消滅不穩定因素於萌芽」的維穩邏輯也變本加厲。在烏坎等極少數特例或樣板之外，中共迄今的主導性政治原則仍是「避免重蹈國民黨之覆轍」，亦即：繼續強化列寧主義黨國體制，以預防、壓制任何（可能）脫離中共控制的「自組織」力量之興起。

在 1980 年代，儘管並未實現政治改革，但成立了「政改辦」，政改的重要性起碼得到了認知（高放，2006）。1992 年後的新一波經濟改革開放，則從一開始就清楚是以鞏固一黨專政、「穩定壓倒一切」作為前提。由於新興社會力的發展空間遭到政治壓制，替代性的社會與政治整合機制始終難以茁壯。這遂種下了一個揮之不去的悖論：如果中共真的垮了，大陸能否避免亂局？而如果中共當前的政經體制繼續維持下去，又真能逐漸實現憲政民主嗎？如果「後極權體制」不但不朝向憲政民主漸進，甚至堵住了漸進道路的大門，成功的憲政民主該如何實現？

二、漸進道路可能失敗

李澤厚反對畢其功於一役的民主革命，袁偉時則反對黨國集權的政治激進主義。這兩種反對，皆是「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李、袁低估了另一問題的重要性：漸進道路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失敗，其阻力並非僅僅來自於所謂的政治激進主義。

就六四後的大陸來說，漸進道路之所以至今尚未形成，主因在於中共堅

拒和平的政治漸變。應該說，李澤厚並不是沒有注意到這種政治可能性。所以他強調，他不是新權威主義或新保守主義者，而主張朝向憲政民主的漸變；而如果既存體制抗拒此種漸變，那就必須對其施壓。這些說法言之成理，但李澤厚爲了強化他「中國應避免革命」的基調，實則並未把「當權者抗拒政治漸變及其可能後果」納爲重要的探討對象。

前文指出，李澤厚通過歷史與當下的辯證，主要是提出了「革命有害無利」和「漸進道路可能成功」這兩項論斷。本文無意於否定或駁斥這兩項看法，亦肯定其提出新問題意識的貢獻。但漸進道路「可能成功」並不是一個強的說法，而是一個比較弱的論斷；因其並沒有爲漸進道路的成功條件，及其所面臨到的實際障礙或難題，給出更多實質的探討空間。漸進道路所需要克服的阻礙，顯然不僅止於「政治激進主義」（此指民主革命主義）而已。

在作者看來，正因爲李澤厚單面向地極度強調政治激進主義的惡果，他的言說效果（若非意圖）是壓縮了其他政治社會因素的討論空間。在第貳節裡，我們引入了汪榮祖、余英時、張朋園等史家的實質論點，其目的不在於視其爲定論，而在於凸顯：李澤厚並未把制約漸進道路的其他政治社會因素納入考量。在他以反激進主義作爲重心的言說中，其他因素的重要性被低估了。他強調漸進「可能成功」，卻低估了漸進也「可能失敗」。如果說漸進主義者應盡力避免漸進失敗，並爲漸進道路開創出更多更有利的條件，那麼，單單批判「政治激進主義」（此指民主革命主義）是不夠的。即使壓制了「政治激進主義」，也不表示「可能成功」的漸進道路就「真會成功」。更何況，更艱難的問題在於「如何成功」。

早在李澤厚提出告別革命論的 1990 年代初，不少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大陸將進入一段政治停滯期，中共極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展開任何政治改革。但在李澤厚的言說中，「政治激進主義」（此指民主革命主義）則儼然是妨礙中國漸進的主要障礙。實際上，在 1992 年後的經濟增長和「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革命的煙硝味一直很淡，直到晚近才又猛然竄起。晚近隨著社會不滿的升高，加以利益表達渠道受到政治壓制，各界的政治焦躁都在上升，有意推倒重來的情緒也在抬頭，而這實與政治拒變主義所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息息相關。

歸根究柢，李澤厚政治言說的基調在於挑明革命之為禍。在晚近的一次專訪中，李澤厚（2011）基本重申了他在1990年代所提出的反激進和漸進論點。實則，他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漸進不成」有其種種複雜成因。但在「反激進主義」的言說主題下，他相當程度壓抑了這些重要課題的討論空間。

三、理念及其實現

袁偉時也把歷史上的「漸進失敗」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政治激進主義」，但究其實質，他的言內和言外之意都不同於李澤厚。李澤厚最關切的是「六四後的中國要避免革命」；而袁偉時對「革命幼稚病」和「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則幾乎都指向六四後的中國現實。他把「政治激進主義」界定為一種與孫中山有關的、主張黨國集權的、欠缺法治與民主的、帶有大一統思維的主義。他主要的批評對象究竟是誰，不言可喻。

在作者看來，袁偉時也低估了制約漸進道路的其他政治社會因素，但具體原因卻與李澤厚非常不同。李澤厚是出於「避免革命」的言說導向，大體迴避了「漸進不成」的政治社會分析。袁偉時也迴避了這類分析，但卻是出於「以思想啓蒙批判現實」的言路。在第參節裡，我們除了歸納出袁偉時的主要論點，亦指出他的史論中的一些內在緊張。

在袁偉時的自由民主理念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強烈反對中央集權，並主張中國應實現聯邦制。前文指出，在民初軍閥割據期間，孫、蔣的國民革命路線是指向中央集權的；但在當前大陸的中央集權體制下，聯邦制則意味著地方或各省的高度自主，意味著向地方分權的方向做出調整。此種調整能否成功，聯邦制能否一步到位，或許都仍有探討的空間。內地各省的聯邦制安排，除了涉及各省之間的貧富差距，以及聯邦政府的政經權力外，也還牽涉到袁偉時念茲在茲的「大一統思維」的慣性問題。袁偉時之不斷批判狹隘民族主義和大一統思維，正是因為後者是有極大影響力的。在藏維問題上，更是如此。

試想：如果在大陸民主化、地方分權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強勁的分離主義運動或地方割據的局面，這是否可能斬斷民主化和地方分權的進程？如果

聯邦制的政治整合基礎尚不穩固，該如何面對這個問題？³³

袁偉時的言說策略是不斷宣揚基本理念，以推行思想啓蒙。例如，他對民初臨時約法的批評，訴諸的是今日的憲政民主理念。他亦從聯邦共和的理念出發，通過「聯省自治可能成功」的說法，以強化「中國應實現聯邦制」之主張。但憲政民主和聯邦制能否在未來的中國實現，還涉及到基本理念之外的其他實現條件。在袁偉時以史載道的史論當中，聯省自治的理念本身並無問題，所有障礙似乎都來自於主張中央集權的孫中山等人。然而，從「漸進實現憲政民主」和「漸進實現聯邦制」的角度，我們有理由對此說法感到不安。畢竟，主張「漸進」的最重要理由在於：無論是憲政民主還是聯邦式憲政民主，都有其一定的實現條件（甚至成功條件）需要養成。思想觀念的變革，無疑是其重要的實現條件之一，但並非全部。

聯邦式憲政民主能否成功實現，不單單是思想觀念層面的問題。在通往聯邦式憲政民主的漸進道路上，袁偉時所界定的「政治激進主義」及其相關的意識型態，無疑是需要化解的重大阻力。但在這些所謂的「思想迷誤」之外，聯邦式憲政民主的成敗與否，也還取決於他未能納入考量的其他政治社會因素。

反對推倒重來的民主革命主義（李澤厚），和反對中央集權的黨國體制及其意識型態（袁偉時），皆是「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題中之意。但在本文看來，主張「漸進」的最關鍵理由在於：成功的憲政民主並非一蹴可幾，而有其一定的實現條件需要養成。正因如此，單單強調「漸進道路可能成功」或「聯邦式憲政民主可能成功」是不足的。除非進一步探討漸進道路的種種成敗條件，否則，「可能成功」將只是一種關於「可能性」的抽象陳述而已。

陸、結論

本文以「革命的幽靈」為題，探究當代大陸思想界的兩個「反激進主義」觀點，及其背後「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問題意識。李澤厚從告別革命的出

33 王力雄（2006）是較早提出這一問題意識的大陸論者之一。

發點，通過對辛亥革命、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以強化「革命對中國有害無利」、「漸進道路可能成功」等政治見解。袁偉時則從思想啓蒙的視野，結合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通過對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以肯認中國「需要思想觀念的徹底變革」、「應實現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等主張。

在第貳、參節中，我們分別歸納出李、袁的主要論點。李、袁皆欲全盤否定革命、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想，並從「反激進」、「反革命」的角度去界定「漸進」。兩者皆採取借古諷今、以史載道的言說策略，皆把歷史上的「漸進失敗」主要歸因於、並歸咎於「政治激進主義」。李澤厚提出「辛亥革命是激進主義思潮（加上偶發事件）的結果」、「戊戌變法可能成功」、「君憲道路未必走不通」等歷史論斷。袁偉時的史論則包括：若非孫中山不斷革命，民初憲政和議會政治可能成功；孫中山的革命幼稚病，導致袁世凱「失去制衡而滑向從專制到稱帝的死亡道路」；即使後來軍閥割據，聯省自治道路仍可能成功。照李、袁的陳述，政治激進主義（激進主義思潮、革命主義、革命思想等）須為清末民初的「漸進失敗」（清末君憲失敗、民初憲政失敗、議會政治失敗、聯省自治失敗等）承擔最主要的罪責。

李、袁之針砭歷史，本是立基於各自具體的當下政治關懷。通過對歷史上的「革命」和「政治激進主義」的批評，他們試圖強化「反激進」、「反革命」、「以漸進變革實現憲政民主」等當下政治主張。由於本文是一篇思想性的探究，因此並未深入李、袁所涉及之歷史爭議。但在第貳、參節中，我們仍對李、袁的史論提出了一些基本觀察，而其目的僅僅在於點出：李、袁的歷史論斷並未把激進思想、革命思想以外，其他制約漸進道路的政治社會因素也納入考量。

在第肆節裡，我們進一步對李、袁的當下問題意識提出分析。在六四之後，李澤厚最主要的政治關懷是「中國一定要避免革命」；他相信六四後中國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可能導致革命的政治激進主義。同樣在六四之後，袁偉時成了中共體制的堅定批評者；他認為中國最主要的問題出在思想觀念變革的不徹底，因此堅持繼續思想啓蒙，不斷宣揚自由民主與聯邦共和理念。對李澤厚來說，「政治激進主義」是一種與八九民運有關的民主革命主義。

但在袁偉時那裡，「政治激進主義」則是一種反自由、反民主、反法治、主張黨國集權的、與孫中山和國共有關的「中世紀」意識型態。

儘管如此，李、袁的反激進主義言說仍有一定的同構性，並且呈現出一種共通的侷限性。在第五節中，我們以民主轉型研究作為參照資源，從「漸進實現憲政民主」的角度分析指出：成功的憲政民主並非一蹴可幾，而有其一定的實現條件需要開創、養成。李、袁的「漸進道路可能成功」之說，低估了漸進道路也可能失敗。他們過於單面向地從「反激進」、「反革命」去界定「漸進」，儼然把「政治激進主義」視為妨礙漸進的最主要因素，甚至單一因素。其他制約漸進道路的政治社會因素，則未能得到同等的重視，其探討空間遭到了壓縮。

本文對李、袁言說的探討，毋寧也是出於一定的當下問題意識。從今日大陸的政治現狀來看，百年前的「漸進失敗」似仍可能重演。時下所謂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究竟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正朝向憲政民主漸進，迄今仍是個巨大的問號。民主革命的代價過高，且通常難以締建出相對成功的憲政民主，而主張「漸進」的最關鍵理由即在於此。但如果後極權體制堅拒和平的政治漸變，那在某些情況下，就可能助長推倒重來的革命心態。

如果說革命是不可欲的，漸進道路也是可能失敗的。除非充分認知到漸進道路「可能失敗」，並致力為其創造更多更有利的實現條件，否則，「革命的幽靈」恐將繼續與我們同在。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王力雄

2006 《遞進民主》。台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王超華（編）

2004 《歧路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余英時

1992 〈再論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激進與保守：答姜義華先生〉，《二十一世紀》4月號總10: 143-149。

- 1998 〈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2月號總45: 4-14。
- 2000[1988]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見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頁1-29。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余英時等
1999 《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啓蒙運動》。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吳國光
2004 〈「縣政中國」——從分權到民主化的改革〉，《當代中國研究》第1期總84。共識網，2011年9月15日，取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001202793.html
- 宋 宏
2007 〈難以掙脫的困境——關於激進與保守的論爭〉，見許紀霖、羅崗等（著），《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頁43-71。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李世濤（編）
2000 《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李曉蓉、張祖樺（編）
2009 《零八憲章》。香港：開放出版社。
- 李澤厚
1987 《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1 〈告別辛亥革命〉（馬國川專訪）。香港蘋果日報，2011年9月18日，取自 http://www1.hk.apple.nextmedia.com/template/apple/art_main.php?iss_id=20110918&sec_id=4104&subsec_id=11867&art_id=15623452
- 李澤厚、王德勝
2000[1994] 〈關於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見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頁74-83。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李澤厚、李緒源
2011 《該中國哲學登場了：李澤厚2010年談話錄》。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李澤厚、劉再復
1999 《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台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
- 汪榮祖
1983 《晚清變法思想論叢》。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2 〈激進與保守贅言〉，《二十一世紀》6月號總11: 133-136。
1998 《康有為》。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尙明軒
2008 《孫中山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 金觀濤、劉青峰
1993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胡春惠
1983 《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台北：正中書局。
- 袁偉時
1987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上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2 《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深圳：海天出版社。

- 1998a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8b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2000 〈新文化運動與「激進主義」〉，見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激進與保守之間的動盪》，頁 252-270。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 2003a 〈中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開端與挫敗〉。中山大學哲學系，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philosophy.sysu.edu.cn/papers/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7>
- 2003b 《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2006a 〈孫中山的北伐戰爭破壞了中國的憲政和民主體制〉。360doc 個人圖書館，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529/10/7099_124350.shtml
- 2006b 〈袁偉時教授訪談錄：回望百年共和路〉。新華網，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6-11/17/content_5341471.htm
- 2006c 〈民初「護法」與法治的歷史經驗〉。世紀中國網，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6/0715/16/142_156737.shtml
- 2008 〈陳炯明研究管窺（提綱）〉。陳炯明研究中心，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chen-jiongming.com/WenZi/LunWen/YuanWeiShi_ChenJiongMingYanJiuGuanKui/YuanWeiShi_ChenJiongMingYanJiuGuanKui.html
- 2009 〈民國的中國錯過聯省自治——專訪袁偉時〉，《沈澱》第 8 期。天涯社區，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ID=1854128&PostID=19184817
- 2011a 〈反思辛亥百年，市場、民主、自由是不變的主題〉。共識網，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jsj/article_2011011127927.html
- 2011b 〈袁世凱與國民黨：兩極合力摧毀民初憲政〉。中國選舉與治理網，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6090>
- 袁偉時（編）
- 2004 《告別中世紀：五四文獻選粹與解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馬 勇
- 2001a 《超越革命與改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 2001b 〈20 世紀 20 年代「聯省自治」的理論與實踐〉。新法家，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xinfajia.net/4545.html>
- 馬英九
- 2011 〈元旦祝詞：壯大台灣，振興中華〉。中華民國總統府，2011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103&itemid=23187&rmid=2780>
- 高 放
- 2006 《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心聲》。重慶：重慶出版社。
- 高 華
- 2010 《革命年代》。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張朋園
- 1964 《梁啟超與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5 《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三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2006 《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 鳴
- 2008 《武夫當權：軍閥集團的遊戲規則》。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 2011 《辛亥：搖晃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張灝
2004 《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
- 梁啟超
2011[1927] 〈給女兒的信〉，《開放》7月號：56-58。
- 許紀霖
2011 〈許紀霖教授在思勉思想節辛亥百年〉，許紀霖（審閱），田波瀾（採訪整理）。清朝歷史，2011年9月15日，取自 <http://www.qingchao.net/lishi/xujilin/>
- 許紀霖、羅崗等
2007 《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 陳子明
2005 〈州政中國：大國民主中的地方自治〉。愛思想網，2011年9月15日，取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1525>
- 陳志讓
1979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 陳定炎（編）
1995 《陳競存（炯明）先生年譜》（上、下冊）。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陳宜中
2011 〈保守與激進之上：中國政治自由主義的希望與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1：237-279。
- 黃克武
2011 〈台灣學界對辛亥革命的研究〉。辛亥革命網，2011年9月15日，取自 <http://www.xinhai.org/yanjiu/191104297.htm>
- 楊奎松
2008 《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0 《「中間地帶」的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齊墨（編）
1991 《新權威主義》。台北：唐山出版社。
- 劉軍寧
2002 〈聯省自治——20世紀的聯邦主義嘗試〉。共識網，2011年9月15日，取自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article_20100120850.html
- 蕭公權
1988 《康有為思想研究》，汪榮祖（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蕭功秦
1998 〈戊戌激進主義及其影響〉，《二十一世紀》4月號總46：41-48。
1999 《危機中的變革：清末現代化進程中的激進與保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8 《中國的大轉型》。北京：新星出版社。

B. 外文部分

Duara, P.

-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wthorn, G.

1991 *Plausible Worlds: Possibility and Understanding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cters of Revolution: Two “Counter-Radical” Perspectives

I-chung Che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influential “counter-radic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and history,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Sun Yat-Se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One version regards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s a political mistake made by Sun and his followers. According to this view, what caused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above all else, Sun’s “political radicalism,” which obstructed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lternative that would presumably be superior to a revolutionary break. The other version, focusing on what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Revolution, has it that Sun’s addiction to endless revolution, an infantile disorder, was chiefly responsible for the failure of post-revolutionary constitutionalism and parliamentary politics, as well as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evolutionary federalist movement of the 1920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counter-radical” perspectives are at best partial. In ascribing to “political radicalism” too much causal weight that is dubious, both versions tend to sidestep important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political sociology, while overestimating the powers stemming from “radical thought.” Furthermore, as a negation of political radicalism, both fail to grasp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even the seemingly rather mild scenario of “gradual realization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could itself be condemned as politically radical. This implies that the very dramatic opposition between “political radicalism” and “democratic gradualism,” as evident in both versions, is largely unsustainable. Thus, both are found to be wanting as an account of politics and insofar as the democratic future of China is concerned.

Key Words: revolution, political radicalism,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 federalism